



—— BEIJINGHUA SUYU
YU LAOBEIJING SHEHUI FENGQING ——

北京话俗语 与老北京社会风情

党静鹏◎主编

北京文化
漫谈



—— BEIJINGHUA SUYU
YU LAOBEIJING SHEHUI FENGQING ——

北京话俗语 与老北京社会风情

党静鹏◎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话俗语与老北京社会风情/党静鹏主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10
(北京文化漫谈)

ISBN 978-7-300-23571-4

I. ①北… II. ①党… III. ①北京话-俗语-研究②文化史-北京 IV. ①H172.1②K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70312 号

北京文化漫谈

北京话俗语与老北京社会风情

党静鹏 主编

Beijingshua Suyu yu Laobeijing Shehui Fengqing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240 mm 16 开本

印 张 11.5

印 数 209 000

邮政编码 100080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前言

作家萧乾曾感慨：“今天，年轻的市民连城墙也未必见过。他们可知道民国初年街上点的什么路灯？居民怎么买井水？粪便如何处理？花市、牛羊市、骡马市，当年是个什么样子？东四、西单还有牌楼？”^① 历经百年，北京城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都市的繁华湮灭了古都北京的历史面貌，现在的年轻人对过去的北京生活的确知之甚少。今天的北京正在向国际化大都市迈进，然而，在建设世界城市的进程中，我们不能忘却传统，只有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才能在世界城市群中凸显自身的特色。陈平原说：“在城市改造中失落的，不仅仅是古老的建筑，还包括对于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并非只是四合院的问题，还包括对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有无深入的体贴，或者说‘理解的同情’。”^② 我们应怀着几分温情与敬意去探究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去追寻有关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

历史文化的保存与流传，除了依靠遗存下来的物质实体以外，更主要的是依赖语言和文字的记载。每一种文化都有一套独特的语言系统来承载。由于语言系统具有稳定性，尽管某些社会文化发生了变化，某些现象早已消失，甚至没有留下什么实物可以探究，但是这些现象却仍然或直接或间接地保存在语言中。英国著名科学家贝尔纳在《历史上的科学》中说“语言是现今仍然活着的古代遗物”，

^① 萧乾，北京城杂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45.

^② 陈平原，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42.



它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历史信息、文化信息、民俗信息，为人们了解、研究特定地域的历史文化和风俗习惯提供了素材。因此，追寻一个城市的历史风貌、研究一个地方的风俗变迁就不能不从语言入手，从一城一地的方言去探索昔日的社会生活图景。

于是，我们开始循着语言的足迹去探寻北京这座城市的古老风貌。一个偶然的看到一本名为《京华风情歇后语》的小书，书中共收录近 240 条北京话歇后语，作者对每条歇后语的由来及所反映的北京历史文化进行了生动的讲解。作者在“前言”中说：“那些富有地方色彩、生动精炼而又幽默的歇后语，不但成了人们表达复杂思想感情的工具，而且深刻地反映了北京的过去和现在。”^① 词汇是语言系统中与社会生活联系最为密切的部分，其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也是最直接、最鲜明的，而词汇系统中那些由百姓创造并活跃在百姓口语中的俗语则是反映百姓社会生活最为直接的窗口。俗语是一种叙事，将故事与风情浓缩于短小的语言形式中，生动地将百姓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描绘出来。俗语是一张张老照片，拍下了昔日的生活图景，照片虽或已泛黄，或已破旧，可上面的人和景却又是那么鲜活、那么生动，每当拿起这些老照片，看着照片上的人和景，昔日的生活就又生动地浮现在眼前，尘封在记忆里的往事重又涌上心头，温暖而亲切。你可记得“雍和宫里跳布扎——鬼闹的”？你可记得“燕九佳节看新鲜，白云观里会神仙”？还有那“厂甸的糖葫芦——串上了”，中秋节街市上的兔儿爷，它们如此憨态可掬，有的“兔儿爷折跟头——窝了犄角”，有的“兔儿爷拿大顶——窝犄角”，有的“兔儿爷掏耳朵——崴泥”，有的“兔儿爷洗澡——瘫啦”……当然，你也一定还记得“天桥儿的把式——光说不练”，还记得春天里“杨柳青，放空钟”的快乐，冬天里“十月冰床遍九城”的盛况！……北京的神儿！北京的味儿！你会深深地感叹：这才是北京！北京话俗语宛如一段段历史的记忆，虽历经漫长岁月的尘封也难以磨灭其历史的光华，一言一语、一字一句之中无不显示出它们与昔日京城社会生活的种种联系。它们满载着北京历史文化的积淀，包蕴着北京特有的事物与风习，为后人留下了有关这座城市的记忆，并将这座古老城市的故事流传下去。

本书将通过北京话俗语的梳理与分析，描绘俗语中记录并展现出的古都北京的历史文化与社会风俗。需要指出的是，俗语这种语言形式不是以系统的、完整的方式来反映社会风俗，而是以碎片化、片段式的形式呈现，所以不能寄望于通过描写俗语而将北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完整地呈现出来。尽管如此，这些俗

^① 柳丛，崔永福，刘建业. 京华风情歇后语.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7：2.

语所记录的、所描绘的，也足以为我们呈现出一幅生动的老北京社会风情画卷。

全书共八讲，第一讲“语言与文化”，讨论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第二讲“京腔京韵北京话”，介绍北京话形成的历史和北京话的特点；第三讲“俗语与民俗”，阐释俗语与民俗之间的关系；第四讲至第八讲分别透过北京话俗语看老北京人的衣食住行、娱乐消遣、岁时习俗、老北京百业以及宗教和民间信仰。让我们透过这些俗语一起走进那个带着历史温度的古都，去感受老北京人的生活，探寻古都北京的历史风貌。



目 录

- 第一讲 语言与文化 // 1
- 第二讲 京腔京韵北京话 // 6
- 第三讲 俗语与民俗 // 17
- 第四讲 北京话俗语与老北京人的衣食住行 // 33
- 第五讲 北京话俗语与老北京人的娱乐消遣 // 71
- 第六讲 北京话俗语与老北京的岁时习俗 // 91
- 第七讲 北京话俗语与老北京百业 // 109
- 第八讲 北京话俗语与老北京人的宗教和民间信仰 // 133
- 结 语 // 170
- 参考文献 // 172



第一讲 语言与文化

一、语言

语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语言仅指有声语言，即以语音为物质外壳的符号系统。语言系统包括语音、语义、词汇和语法四个子系统。广义的语言包括有声语言和文字，文字是记录有声语言的一套符号系统，文字产生以后，语言就不仅有口头存在形式，也有了以文字为载体的书面存在形式。语言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与人之间进行信息传递和情感交流最重要的媒介，语言也是人类思维的工具、认知世界的工具，同时也是记录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语言似乎是个很平常的东西，人们往往不会意识到语言对于每个个体以及整个人类来说所具有的重要性。德国哲学家、文化哲学创始人卡西尔认为，人类生命的特殊标志就是除了一切动物都有的感觉器系统和效应器系统（生物体对刺激做出反应）之外，人还有符号系统。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动物只能对“信号”做出条件反射，人能够把这些信号改造成为有意义的“符号”。人不只是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且还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这里所说的符号包括艺术的想象、神话、宗教仪式等，但其中最典型、最稳定的是语言的形式。^①

^① 申小龙. 汉语与中国文化（修订本）.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2.



二、文化

历来对于文化的定义，可谓众说纷纭，20世纪有关文化的定义就有100多种。这些定义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文化，专指精神文化，即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其相适应的典章制度、政治和社会组织、风俗习惯、学术思想、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1871年英国著名人类学家泰勒给文化下过一个著名的定义：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与习惯的复杂整体”，该定义强调的是精神方面的文化，即狭义的文化。广义的文化，指每个民族为了生存与发展，积年累代，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通过体力和脑力劳动所取得的各种成果和成就的总体。广义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苏联学者谢班斯基这样给文化下定义：“文化是人类活动的全部物质和精神成果、价值以及受到承认的行为方式。”美国人类学家克鲁柯亨认为文化的确切含义是指“整个人类环境中由人创造的那些方面，既包含有形的也包含无形的。所谓‘一种文化’，它指的是某个人类群体独特的生活方式，他们整套的‘生存式样’”^①。

一般将文化划分为三个层次：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物质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种种物质文明，如生产和交通工具、日用器具、服饰、饮食、房屋等，是一种显性文化。制度文化是指种种制度和理论体系，如饮食习惯、建筑工艺等生活制度，婚姻形式、亲属关系等家庭制度，教育、宗教、礼仪、法律等社会制度，以及有关这些制度的各种理论体系。心理文化包括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属于隐性文化。^②

三、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与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一方面，语言本身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每一种语言都是在特定的文化土壤中孕育成长的，它的产生和发展演变与人类思维、社会发展、交际需要、自然生态等息息相关；另一方面，语言又是人类社会及其文化建构、发展和传承的主要载体，人类及其文化活动的成果都是因语言及其文字系统的传载而得以流传广布。在人类文化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语言起了关键的作用，同时，文化的不断发展也促使语言更加丰富和细密。正如著名语言学家柏默所说：“语言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是相辅而行的，它们可以相互协助

^① 邢福义. 文化语言学（增订本）.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8.

^② 同①9.

和启发。”国内外关于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可谓源远流长。中国古代之文字学和训诂学都涉及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东汉文字学家许慎作《说文解字》，对9 353个汉字追踪溯源，析字之结构，探字之本义，同时反映了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自汉代至清代，在对经籍的注疏训诂之中更不乏关于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精辟论述。在现当代的中国学者中最早对语言与文化关系进行专门探讨的首推罗常培，20世纪50年代罗常培出版《语言与文化》一书，着重从语词的含义讨论语言和文化的关系，被誉为“自觉研究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①。在西方，有近代学者德国著名语言学家洪堡特关于语言与精神文化关系的论述，他认为语言决定人的世界观；有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沃尔夫提出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他们认为语言决定文化；德国著名文艺理论家和语言学家赫尔德则认为，语言的特质就是该国文化的特质。美国人类学家A. 怀特说：“人类的全部文化（文明）依赖于符号。正是由于符号能力的产生和运用才使得文化得以产生和存在，正是由于符号的使用，才使得文化有可能永存不朽。没有符号，就没有文化，人就仅仅是动物而不是人了。”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曾说，语言忠实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地反映了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众多语言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学者都进行过关于语言与文化关系的讨论。

语言是记录和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一方面，以语言文字为媒介的历史著作、文学作品，记录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及其创造的文明硕果；另一方面，语言文字本身因其产生于特定文化环境而被打上深深的文化烙印，成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比如，汉字“纸”的偏旁为“纡”，这是由于该字产生于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之前，那时中国曾用丝絮造纸，因此“纸”字的字形保留了有关古代造纸技术的文化信息。又如，北京话有个歇后语“万寿寺弯腰——顶儿上见”，是对旧时北京城万寿寺和西顶娘娘庙的庙会民俗的记录。再如，语言中的借词记录了文化之间的接触与传播，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与之相伴随的是长期以来两国语言文字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借鉴，日语中大量的汉字词以及汉语中大量的日语借形词就是最好的明证，通过对借词的研究可以揭示文化交流的路径与过程。

语言不仅记录、承载文化，其对文化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某些文化现象的形成以及对其所作的阐释就有赖于语言。例如，民间老寿星的画幅中画有寿星、寿桃、鹿和蝙蝠，表示福禄寿三星高照，这是由于“鹿”与“禄”同音，蝙蝠之

^① 邢福义. 文化语言学（增订本）.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5.



“蝠”与“福”同音。由于“蝠”和“福”谐音，蝙蝠在京津冀地区还是一种象征吉祥的动物，因此在过年时，民间剪纸作蝙蝠形，贴于窗户和墙壁上，象征福气。又如，过年时我国很多地区都有吃鱼和年糕的饮食习俗，以祈盼年年有余，年年高，这是由于“鱼”和“余”同音，“糕”与“高”同音。再如北方民间旧时婚礼习俗，在新婚夫妇进洞房前，由一位年长的女性亲属向寝帐撒枣栗，并唱《撒帐歌》：“一把栗子，一把枣，小的跟着大的跑”，这是利用“枣”与“早”谐音，“栗子”与“立子”谐音，从而取“早立子”的吉意。可见，以上民俗行为的产生是以语言为基础的，反映了语言对文化的影响和制约。

四、方言与地域文化

方言可分为社会方言和地域方言。社会方言是语言的社会变体，是由说话人的职业、社会阶层、年龄、性别等的差异而导致的语言变体。一般人所说的方言是指地域方言，地域方言是语言的地域变体，是语言地域分化的结果。由于人口的迁徙、疆域的扩大、不同民族之间的接触等原因，一种语言会在不同地域逐渐发展成为具有地方特色的地域变体，即地域方言。方言与地域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密切联系，在语言分化形成方言的过程中，地域文化为之提供了独特的、不同于其他地域的物质与精神给养，从而形成了具有独特地域文化底蕴的地域方言。我国古人早已发现地域方言和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礼记·王制》云：“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东汉王充《论衡·自纪篇》说：“经传之文，圣贤之语，古今言殊，四方谈异也。”现代学者林焘先生指出：“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幅员辽阔、方言复杂的大国。远在春秋战国时期，方言之间的分歧就已经相当明显。孟子在说明环境对人的影响的时候，就曾经以当时方言的分歧作为例证：‘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孟子·滕文公下》）要想让楚国的孩子学会说齐国方言，必须把他送到齐国去住几年才行，可见当时齐国方言和楚国方言之间的差别有多么大了。”^① 对方言的收集整理从很早就开始了，“从周朝到秦朝，王室每年秋天都要派官员到全国各地搜集地方歌谣和方言，集中保存在朝廷的‘密室’里，可见当时的统治者是十分重视方言的，可惜这些宝贵的资料在秦末战乱中全部散失了。西汉末年，著名文学家扬雄见到了一些残存的资料，就以这些资料为基础，向全国各地到长安来的人做广泛的方言调查，用 27 年的时间编成《方言》一书，记录下了大量的各地

^① 林焘，普通话和北京话。北京：语文出版社，2000：1。

方言词语，而且一一加以解释。”^①

方言作为一种在特定区域通行的、有别于共通语的活态语言，传承的是丰富的地域民俗文化，彰显的是独特的地域文化个性。作为一种活态的语言文化，方言生长于特定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历史背景、传统习俗中，被掌握共同地方风物、历史、习俗等地域亚文化的民众所熟知、运用，充当着对该地区文化进行记录与传承的“活化石”。^② 方言的形成与特定地域人们特殊的文化心态、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生活生产方式等密不可分，地方文化结构深埋在方言结构之中，方言中保存着历史、文化的遗迹，因此方言研究对于真正把握各地人们文化独特性的深层结构，往往有很大的帮助。

① 林焘. 普通话和北京话.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0: 2.

② 张筠. 论呈现为民俗文化的活态语言. 青海社会科学, 2012 (3).



第二讲 京腔京韵北京话

一、北京话的形成与发展^①

北京“右拥太行，左往沧海，抚中原，正难免，枕居庸，奠朔方”，它南襟中原，北连朔漠，位于中原农耕民族与塞外游牧民族接壤之地，历来为中华民族内部诸族融合之区。五代以降，契丹、女真、蒙古、满洲先后在北京奠都，北京迭次成为上述少数民族为主体民族的北中国或全中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②自金海陵王 1153 年迁都北京以来，北京作为封建王朝都城的历史有七百多年之久，为后世留下了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遗产。北京话也在北京这片独特的土地上孕育、成长。

从文字记载来看，北京地区最早的有一定规模的居民点，是在永定河古渡口附近的蓟，亦称蓟丘。周初，封召公之后于北燕，都蓟。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大秦王朝，分天下为三十六郡，蓟城是广阳郡的治所，成为北方的军事重镇。从秦汉，经魏晋、十六国、北朝，至隋唐，蓟城一带在中国北方的地位日渐重要。隋唐以后，北方少数民族多次入主中原，定都北京，汉族人和少数民族一再交替控制这一地区。

① 林焘. 普通话和北京话.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0: 18-24.

② 阎崇年. 北京文化的历史特点.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5).

北京话在北京城发展的历史风云中也经历了千年以上的发展和变化。至少从隋唐时期开始，北京一直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冲突和融合最频繁的地区之一，当地的汉族人和少数民族长期居住在一起，人口也不断大量流动。一千多年来，北京话始终处于这种开放的环境之中，既和当地少数民族语言（主要是阿尔泰语系的语言）不断交流，也和各地的汉语方言有频繁的接触。语言是社会的产物，越是封闭，发展变化就越慢；越是开放，发展变化就越快。现代北京话和汉语其他方言比较，可以说是最开放的语言；现代北京话保留的古音成分少，语音结构简单，也可以说是发展变化最迅速的汉语方言。

北京在唐代属幽州，936年，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幽州地区从此脱离中原汉族的统治，1153年成为金的国都，改称中都。从辽至金，大量北方少数民族涌进北京地区，原住在北京地区的汉族人民被迫或自愿和他们居住在一起，加强了和他们的联系，而和宋朝统治的中原地区广大汉族人民在政治上完全分离，交往也受到严重的阻碍，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了三百年之久。他们和少数民族语言长期密切接触，和广大中原地区的汉族语言反而日渐疏远，北京话从一千多年前就开始处于这种和其他汉语方言完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这种语言环境对北京话的发展变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辽金两代，契丹族和女真族多次入侵中原，不断俘虏汉族人到东北去，其中以幽燕地区的汉族人占绝大多数，他们所说的方言自然就是以北京话为中心的幽燕地区方言，这样就把当时的北京话和北京附近的方言扩展到了东北地区。汉族人文化高，以所掌握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影响当地的少数民族，汉语在东北各族语言里也就逐渐占了优势。当地少数民族中有不少人在汉族人的长期影响下逐步汉化，最终甚至放弃了自己民族的语言。

蒙古族统治者灭金后统一了中国，建立了元朝，将金中都改称燕京。1271年将燕京改建成元大都，定为都城。大批的蒙古人来到大都，和当地的汉族人生活在一起。元朝的统治者强迫汉族人学蒙古语，有少数蒙古语词汇被大都话所吸收。但是，蒙古族在入主中原以前和汉族的接触远没有契丹和女真族那样频繁，而且统治中国还不到一百年，因此蒙古语对元大都话的影响并不是很大。所谓元大都话，主要是辽金两代居住在北京地区的汉族人和契丹人、女真人等经过几百年的密切交往逐渐形成的，随着元大都的建立而趋于成熟，成为现代北京话的源头。元大都话在形成的过程中虽然会受到当时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但由于这期间汉族人的人数和文化始终处于优势地位，汉语始终是最通行的语言，因此直接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这些少数民族语言在客观上对汉语本身的发展起了很重要的推动作用。

到了明代，北京地区脱离了四百多年的少数民族的统治，重新归属于汉族统



治者建立的政权。经过元末的大动乱，大都城已经残破不堪，明初在元大都的西南建起新的北京城，并且从山西、山东直到江浙一带大量移民以充实北京及其附近地区。永乐十九年（1421年）迁都北京后又有大批高级官吏和他们的家属从南京移居到北京。北京的人口结构在这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和北京人接触最频繁的已经不再是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的语言，而是来自中原和长江以南的各地汉语方言。方言之间虽然有分歧，但同是汉语，差别终究不大，再加上当时方言来源不一，五方杂处，不可能只向某一地区的方言靠拢，这可能就是明代以前发展迅速的北京话到明代趋于稳定的主要原因。据现存的明代记录当时北京话的资料看，明代的北京话已经和现代相当接近了。

到了清朝，北京话又处在另一种特殊的语言环境中。清朝是倾八旗兵力入关进占北京的。清太祖努尔哈赤初建八旗时，满族人在八旗中占绝对优势，随着军事活动的需要，八旗组织迅速扩大，陆续增加了汉军八旗和蒙军八旗。到清军入关时，八旗成分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汉族人的数量大增，在八旗中占了绝对优势。这些在旗汉族人中的绝大多数原来都是世代居住在东北地区的汉族人，他们所说的汉语方言就成为八旗的通用语言，这种方言本是辽金时代随着被掳掠的大批汉族人带到东北地区的，它的基础是以当时的北京话为中心的幽燕方言，在六七百年的漫长时间和当地的少数民族语言密切接触，这时又随着八旗兵进入了北京，和直接由元大都话继承下来的当地北京话同时并存于当时的北京城。

明代兴建的北京城分为内城和外城两部分，内城是皇宫所在地，外城在内城之南，起拱卫内城的作用。清军进入北京后，为了保卫皇宫，把内城全部划归八旗驻地，所有原住在内城的汉族人除了已经投充满族的以外，一律强迫迁居到外城去住，内外城居民界限分明，内城主要是新从东北移居来的八旗军，外城则是原来住在北京的汉族人和其他民族的人。一直到清朝中叶，满汉分居的规定仍然执行得相当严格，外城的汉族人口骤增，各地来京的官宦、商贾以及历年的应试举子也都只能居住在外城，人口密集，各省设立的会馆林立，很快就发展成为北京的商业和文化中心。乾隆以后，满汉分居内外城的规定执行得不十分严格了，但人口的基本结构并没有改变，直到二十世纪初，八旗人口在内城仍占一半以上，在外城则不足5%。

现代北京话就是在三百多年来内、外城人口结构完全不同的条件下逐渐形成的。外城汉族人说的是土生土长的北京话，这种方言在元代以后一直和汉语各方言有密切接触。内城八旗人说的是东北带来的汉语方言，源头是辽金时期以当时的北京话为中心的幽燕方言，一直和东北的少数民族语言有密切的接触。两种

方言来源相同,但所处的地区和所接触的语言不同,自然会产生一些差异。不过,从辽代直到明代,由于战争、俘虏和移民等原因,两地区的人口始终在不断大量流动,两种方言也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并没有产生重大的分歧。到了清代,两种方言在北京汇合,一在内城,一在外城,相互之间的差别本来就不大,再经过长时间的密切交流,就逐渐融为一体,成为现代北京话。由于内、外城人口结构在清代一直没有重大改变,所以这个融合过程相当缓慢,直到二十世纪初,内城满族人和外城汉族人的口音还有明显的区别。随着城市交通的不断发展,人口的大量流动,内、外城的口音差异今天已经消失,从现在年轻人的嘴里,已经完全听不出内、外城北京话还有什么区别了。

二、北京话与普通话

在有方言分歧的社会里,为了交际的便利,往往需要一种民族共同语,作为操不同方言的人交际时使用的共同交际工具。汉语内部方言分歧非常大,操不同方言的人彼此无法相互沟通,因此需要有一种民族共同语作为操不同方言的人的交际工具,汉民族共同语即普通话。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词汇,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的汉民族共同语。

北京话是指北京市城区通行的方言。传统观点认为北京话的范围在东城、西城、崇文(今已归入东城区)、宣武(今已归入西城区)四个老城区内。今天的北京城区的范围在不断扩大,居民的大量搬迁使北京话突破了四城的范围,但其核心仍然保留在四城之内。祖居北京,在北京出生、长大的北京人所说的北京话更为纯正地道,具有代表性。^①

很多人往往把普通话和北京话等同起来,但事实上,普通话和北京话不是一回事。胡明扬先生指出:“普通话实际上是在现代白话文的影响下,在北京话的基础上形成的,通行于广播、电影、话剧等群众性宣传渠道的汉民族标准语。普通话的基础方言不是哪一个地点方言,也不是泛泛的北方话,而是一种在现代典范的白话文著作的影响下通行于北京地区知识阶层的社会方言。因此,普通话既不是以北方话为基础的‘官话’,也不是作为一个地点方言的‘北京话’。”^②从形成的过程来说,北京话是在漫长的、与其他语言方言不断接触和融合的过程中自然而然逐渐形成的。普通话是规范的民族共同语,也就是民族标准语,是在有意识的民族语言规范化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普通话继承了以宋元话本为基础形成

① 周一民. 现代北京话研究.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202.

② 胡明扬. 普通话和北京话(上). 语文建设, 1986(3).



的并且在“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中充实、完善的白话文传统，以北方话为基础，不断充实和锤炼，超越北京方言和汉语其他方言，成为现代汉语的标准语。

林焘先生指出：“普通话是规范化的汉民族共同语，发音、用词、造句都要求有比较强的规范性，这种规范性在书面语言里表现得尤其明显；北京话只是汉语的一种方言，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一般并没有规范的要求，发音、用词、造句都比较自由随便，显得活泼有生活气息。”^① 在具体语言要素层面，普通话和北京话之间也存在不小的差异，体现在语音、词汇、语法诸方面。“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指的是把北京话的语音系统作为普通话的语音标准，包括北京话的声母、韵母和声调以及它们之间的配合关系，其中并不包括北京方言土语里的一些语音成分，这些听起来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成分自然不能作为普通话的语音标准”^②，一些词的读音在北京话中和普通话中不同，如“逮”，北京话读 *dei*，普通话读 *dāi*；“朽”，北京话读 *qiǔ*，普通话读 *xiǔ*。一方面，北京话里的一些音节超出了普通话的音系范围，例如“概”[kai³⁵]（概喽：揽取，吃），“抓”[t § ‘ua²¹⁴]（作抓子游戏），“屎”[§ ei⁵¹]（屎又音：拉屎）；另一方面，普通话里也有一些音北京话不说，例如“喔”[o⁵⁵]、“欸”[E⁵⁵]、“弄”[luN⁵¹]（～堂）。^③

北京话和普通话在词汇方面的差异更为明显，尽管普通话已经吸收了大批北京话的词汇，但还是有相当一部分词汇北京话和普通话不同，并且还是一些常用的词汇。比如：

北京话	普通话
瞧，瞅	看
且，结，打	从
头里	前面
胰子	肥皂
起子	酵母

北京话和普通话的一个显著区别是北京话有很多词儿化，普通话不儿化。以下是一些北京话须儿化而普通话一般不儿化的例子：

北京话	普通话
媳妇儿	媳妇
盆儿	盆
茶几儿	茶几

① 林焘，普通话和北京话，北京：语文出版社，2000：20。

② 同①13。

③ 周一民，现代北京话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02。